

西戎●著 希望出版社

寄语文学青年



寄语文学青年

西 戎

希望出版社

寄语文学青年

西 戎 著

希望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作协山西分会编辑部编

山西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 6.5印张 101千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书号：10398·42

定价：1.00元

目 录

我这样走向生活（代序）	1
漫谈写作	8
文艺创作的中心是写人	21
语言问题漫谈	26
从“因为它是文艺”说起	31
也算创作经验	38
也谈深入生活问题	47
学习老赵，为农民写作	58
读两届获奖小说有感	64
走向广阔的道路	77
一篇作品的思索	84
老话重提	90
自学杂谈	93
再谈作家的责任	96

下乡生活漫忆	99
我迈出的第一步	105
《吕梁英雄传》写作前后	116
期望于广大青年作者的	123
介绍一点我们的文学创作概况	127
“出书、出人、走正路”	133
艺术贵在创新	139
拨出时代的最强音	147
《宋老大进城》后记	152
《猪的喜剧》序	155
《镢柄韩宝山》序	161
《成名之前》序	167
《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序	172
《耧铃丁当的季节》序	179
关于《喜事》的写作答友人	185
与南志中谈《农妇》	188
复文学青年陆明光	191
和青年读者党庆波谈作家的责任	193
给青年作者刘世同来稿的复信	196
给文学青年李长明的信	198
后记	201

我这样走向生活（代序）

一九四二年冬，我在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学习结束以后，因精兵简政开始，便跟随从战斗剧社精简下来的干部，返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接受新的工作分配。

前方也正在精兵简政。我住在招待所，因为等候分配，自然对将来从事什么工作要作点考虑。在延安学习期间，我虽然读了些书，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还没有写过象样的作品，年纪轻轻就立志想搞创作，领导会同意吗？

幸好，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刚参加革命时的剧团领导林杉同志。经他介绍推荐，我便到了晋西北抗联文化部。

抗联文化部由原晋西北文联领导人亚马同志负责。亚马同志，虽然初次见面，他的名字，我早有所闻。听说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已在太原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他对党的文艺事业，很热心，对人才

的培养，也极为关注，如我这样还很幼稚的年轻人，他非但不嫌弃，反而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支持。和我同时被他接收下来的青年，还有马烽、孙谦、李束为、胡正、常功等十多人。

当时，延安刚刚开过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我们对毛主席的《讲话》，进行了认真学习，思想上明确了许多问题，决心无条件地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和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写出反映时代的新作品。这就是我们的共同意愿。

当时，各分区的条件都很艰苦，敌占区更为险恶，大家出发的时候，没有人犹豫动摇，坚定不移地迈开了走向斗争生活的步伐。

决定让我去的地方，是晋西北第二军分区所辖保德县第四区。这里，从整个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来说，称作内地，其实距敌据点也不过百十华里，随时都有被敌人突袭“扫荡”的可能。这里土地贫瘠，文化落后，人民生活十分寒苦，除沿黄河有些种植枣树的河湾地，其余皆黄土丘陵。民食以黍菽野菜为主，当地流行的民谣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婆姨挑苦菜，汉子走西口”。这就是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九四〇年，我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了这个穷地方，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颁发了一系列团结抗

日、改善民生、发展生产的政策法令：减租减息、反霸回赎、变工互助、劳武结合、植棉纺织、贷款互济等。新政府的政策法令贯彻后，短短两年时间，这里的对敌斗争形势、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群众发动起来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普遍展开，农民开始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从未种过棉花的土地上，棉苗也开始开花结果。由于植棉纺织运动的开展，一家人盖一张被子的苦日子，就要结束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处办起了纺织训练班，整个根据地减租生产运动，搞得热气腾腾。

我正是在这种热气腾腾的日子里，来到了保德县第四区抗联担任文化部长的。

区抗联的组织机构有武委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文化部。每个组织，实际只有一名干部。当时，党的组织尚未公开，区委的公开名称是民运组，只有书记和交通干事各一人。全区的群运工作，就靠区民运组、抗联这六七个干部来做。区公所也设区长、助理员三名干部，主要是搞征兵、征粮、税收和解决日常的民事诉讼。

我来区抗联报到以后不几天，便发给我一套由妇救会帮助做成的群众服装。我脱掉从延安穿回的军装，头上戴上了毡帽，身上穿起了藏青色的棉袄

棉裤，腰里扎一根褐色腰带，脚上蹬了一双牛鼻子山鞋。棉袄口袋里除了水笔和用旧线装书翻订的记事本，再就是吃派饭通用的根据地粮票。我瞧着镜子里自己的穿戴，俨然成了一个农民，我为自己的群众化感到新奇，同时也为自己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而感欣慰。

从此，我和区里的所有抗联干部一样，为了每一项中心任务，不间断地下乡，翻沟越峁，走村访户，走到哪里，就工作在哪里，也就吃在哪里，住在哪里。真是“处处无家处处家”了。每当在一个村子里住上十天半月，老老少少，熟若家人。山里人待人憨厚热情，他们生活很苦，总要做最好的饭食给你吃，借来新媳妇的被子给你盖，夜晚盘腿坐在热炕上围灯谈心，把最知心的话儿说给你听。仿佛我就是他们家、他们村的成员之一。诸如兄弟分家、婆媳吵架、立约、换帖、写信……事无巨细都来找你。我开始尝到了纷繁生活的乐趣，时而也产生写作冲动，但是比写作想得更多的，还是我作为一个抗联干部所肩负的工作任务。我总觉得住在一个村子里，有作不完的工作等我去做，有解决不完的问题，等着我去帮助解决。我看到有的大闺女没有裤子穿，围着毛帘口袋坐在炕上，心里万分不安，我要说服他们种棉花，我要教会她们纺线织布。我

曾向妇救会主任学习纺织技术，也曾大着胆子在自己工作的村子里，开办纺织训练班，居然也成了纺织技术干部。每到一村，便被妇女们包围了起来，从她们那一双双期待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她们对学习新的生产本领的渴望。

通过推动纺织工作，我了解了她们在生活上的困苦，在婚姻上的向往。使我结识了许多平素不易结识的老大娘、小媳妇，知道了许多平素不易摸透的婚姻、家庭问题。这时，我慢慢悟出了一条道理：单纯地去了解生活，只能是浮光掠影，捕捉不住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只有认真地去做好工作，生活自然而然会被你所认识，所理解了。我当时在《解放日报》、《抗战日报》发表的几篇小说、散文、通讯，就是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之余，激情难捺地写出来的。

在我没有下乡深入生活之前，总以为农村工作是比较容易作的。政府号召减租减息，使农民摆脱贫穷的枷锁，难道还会有人不愿意吗？可是当我参加了几个村的减租工作以后，我深深感到，几千年形成的旧道德观念，习惯势力，要使农民自觉起来解除这种无形的束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我费尽唇舌，通宵彻夜地做发动工作，那些受剥削最重的老实农民，依然心事重重，一言不发。他们白天减

了租，黑夜又悄悄地把租子送回到地主家里。追查原因，是村子里起了谣言，说八路军要走了，旧政府又要回来了等等。经过调查了解，替地主传播谣言者，其中就有在斗争会上表现“积极”的二流子。他们是受了地主钱财的收买。经过工作，造谣者坦白了，地主的阴谋揭穿了，又经过办冬学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教育，这些徘徊观望的老实农民，逐渐打消顾虑，参加了斗争。随着运动的步步深入，这些人真正成了保卫农会利益的中坚力量。在反“扫荡”对敌斗争中，他们拿起武器，自觉起来保卫翻身果实。在动员参军，交纳救国公粮等抗战工作中，这些人成了我们党所依靠的力量，可靠的同盟军。

在农村工作、生活了一年，使我增长了许多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方面的知识。我感到了生活的魅力，也感到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

从乡下回来，领导上要我们配合整个根据地减租运动的开展，写一个反映这场斗争的大型秧歌剧本。我和芦梦、孙谦、常功同志，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完成的剧本叫《王德锁减租》。经“七月剧社”演出后，颇受群众欢迎，曾获“七七七”文艺征文甲等奖。同时获奖的优秀作品，以及征文前后出现的优秀作品，有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

李束为的《租佃之间》、李欣的《新与旧》、周元青的《解救》、胡海的《侯圪蛋和他的少先队》、成荫的《打得好》、胡正的《碑》、李文辛的《桂姐捎书》等。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主持文化宣传工作的张稼夫、周文、亚马、樊希骞等领导同志，他们在这块瘠薄土地上撒下的文艺种子，终于生根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新人成长起来了，一批充满家乡泥土气息的作品，给晋西北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是为配合政治任务而写，由于它反映了时代的真实，塑造了生活中的新人，即使是配合任务，同样使人受到精神鼓舞，得到艺术上的满足。

四十年前，我所走的这条生活道路，是我在文学道路上迈开的最有意义的一步。它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六日

漫谈写作

就文学创作，我谈两个方面的问题。先谈谈深入生活的问题。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凡搞创作的人，无不承认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也确乎是关系着一个作家能否写出思想上、艺术上有独特追求的好作品的关键所在。

当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听从生活的召唤，反映这变革着的现实，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但要想在作品中真实地塑造出感人的新人形象，闭门臆造是不行的，必须先去熟悉这新的生活。所谓进一步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关键也在于此。

在这伟大的改革现实中，旧的生活、旧的观念、旧的俗规，都势必会离开原有的轨迹，许多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新事物出现了。改革的复杂形势，瞬息万变的沸腾生活，会使一些人感到茫然和

困惑的。比如过去把商品的多层次流通，一律加罪为“投机倒把”，现在也发生了意义相反的变化，在农村逐渐转向商品生产的新形势下，鼓励组织商品的流通是搞活经济的重要环节。

再说专业户，这也是八十年代农村经济起飞的新生事物。他们代表着新的生产势头，对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起积极作用。当然专业户中个别人的发财手段，并不都是很正当的，但它并非主流。总之一句话，生活是复杂的，多变的，也是丰富多姿的。只有到生活中去，参与生活的变革，从中熟悉它，并加以认真分析、研究、抓住本质主流，通过人物的精神世界，反映出社会的变化和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只有熟悉了解当前改革中人的精神心灵变化，才能凭借艺术的思维塑造出感人的典型形象。

现在有许多写农村题材的作品，都在描写农民致富，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于生活底子不厚，特别是不太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作品中往往缺乏八十年代的时代气息，生活也不太真实，人物也缺少感人的艺术魅力。

既然我们承认生活是丰富多采的，表现在创作上，就不能仅仅是别人怎么写，自己也跟着怎么写。每个作家的生活经历、气质、修养不同，观

察、研究、反映生活，总会各有自己的专长和优势，应该在独创中表现出自己的风格特色。搞创作，切忌走别人走过的路，不但不去重复别人走过的路，连自己走过的路也不应再去重复。既叫创作，就要力争篇篇有新意，篇篇有深度，从生活中发现、采撷大家感觉到但尚未引人重视的素材，熟悉它、理解它。只有理解熟悉了生活，才有可能选取一个新的审美角度艺术地去表现它。一篇成功的作品，不论所写的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总得让读者审美的感受到它的生活气息和艺术魅力。如果缺乏生活，或是对生活缺乏认识、理解，即使天赋很高的作家，也难以写出思想上、艺术上闪光的作品来。有些老一点的作者，年轻时候确实也写过不少好的作品，为什么年纪大了，读书多了，文字功力也比过去成熟了，反而作品少了，其中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脱离生活。

文学作品主要是写人，通过人的精神世界去反映现实生活。要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各色各样的人，作家必须把自己的思想触角，深入到自己深受感动的生活素材中去，力求获得独特的发现。所谓生活的真实，就是作者要把所描绘的各种各样人物，刻画得神形毕肖，合情合理，给读者以艺术的强烈感染。我看《高山下的花环》时，确实动情了。为什

么？因为它有着文艺作品必须具有的而又最为难写的一个字，就是情。写人必须写情。白居易说过这样一句话：“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就是说，文学作品虽然也具有教育作用，但它毕竟不等于教科书，它是用艺术形象的手段完成的，只有情通，方能理达。我们有些作品之所以写得平平庸庸缺乏以情感人的力量，主要是生活不够真实，人物缺乏真情，也就不可能触发读者的情弦，给人留下可咀嚼、可思索引起感情涌动的东西了。

八十年代的读者，他们的欣赏水平、趣味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现在农村喜欢阅读文艺作品的青年，绝大部分是初中毕业回乡的学生。我们的文学作者，如果思想不解放，依然受着极左路线哪些条条框框的制约，写些干巴巴的说教式的作品，便不能满足当今读者的欣赏要求了。他们要求阅读各种风格、题材的作品，并希望作品所描叙的人物、生活，有真情实感。作家脑子里如果只有过去的生活积累，而对今天的生活缺乏真情实感，没有活起来的几个人物，那么最好不要急于去写，还是先去认真思考、研究生活，以免写出废品。所以说生活问题，是一个作家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另外，和作家生活创作有关的问题，就是政策。我们都知道，文学作品，并不要求作家在作品

中去图解政策，但是要想写出好作品，特别是写反映当前农村变革生活题材的作品，作家在生活过程中，又必须学习政策，理解政策。要完全避开政策去写农村生活，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人物的思想、行为，他与社会的关系，必然受政策的左右，若不熟悉政策，就无法理解在现行政策下生活的群众思想活动。文学作品中塑造典型人物，必然要写出人物思想、性格、感情形成的历史因素。几十年来，在我们走过的道路上，因政策的影响而发生的种种历史变化，常常出现作品中反映的生活违背生活的真实。这就要求作家对思想潮流，要有清醒的政治敏感，抓住生活的主流。同时作家对生活的剖析，也要有胆识和勇气，不能有意回避矛盾，要有责任感，通过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矛盾，来充分揭示生活的哲理。不能去图解政策，更不能粉饰臆造。违背生活真实的作品，必然假大空，我们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这样的作品，才能做到既新又深。

真为善美之首。当然，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总是要经过作者对生活的分析研究，提炼取舍，艺术加工后才能成为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的。

说到作家对体验生活的认识，我认为不应当仅